

孔广森春秋公羊学的“通义”解

黄开国 黄子鉴

(四川师范大学 经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8)

[关键词] 孔广森; 公羊学; 通义

[摘要] 在清代今文经学发展史上, 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是第一部以“公羊传”为名的著作, 但此书却并不是公羊学的一家之言, 而是一部“通义”性质的著述。该书并不墨守公羊学家法, 而是主张兼通三传, 甚至六经及其子史之说, 在治学方法上还带有乾嘉汉学重视文字训诂的特色。而他探求的“通义”不过是孔子著《春秋》的“新意”, 但他发明的“新意”, 只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义, 而非微言。

[中图分类号] B2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7)03-0115-04

孔广森(1752~1786), 字众仲, 一字搢约, 号驛轩, 山东曲阜人, 孔子后裔。《清史稿》卷四八一《列传》二六八《儒林二(下)》《孔广森传》中云:“聪颖特达, 尝受学戴震、姚鼐之门, 经、史、小学, 沉览妙解。”孔广森才华横溢, 以少年天才之资, 20岁时就考取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 后授检讨, 因一心著述, 而告养归家。乾隆五十一年(1786), 孔广森因居丧过份悲伤而逝世, 年仅35岁。

尽管孔广森英年早逝, 但他由于从小受到家学的良好熏陶, 其后又得到戴震、姚鼐、庄存与等大师的指导, 在四库馆中又与诸多学者广泛交往, 所以, 他还是在经学、文字训诂诸多方面卓有建树。他的文词在当时就为一些学者所推崇, 如《清史稿·孔广森传》云:“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 江都汪中读之, 叹为绝手。”但是, 孔广森真正的成就并不在训诂文词, 而在经学,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一书。

《通义》的评价不一, 但从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看, 该书无疑是清代第一部明确以训解《春秋公羊传》为名的著作, 对其后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今文经学发展无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 无疑是以《春秋经》与《春秋公羊传》为训解对象, 但此书是否仅为春秋公羊学的一家之学? 对此问题, 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阮元的《儒林传稿》中说:“广森深沉解剥, 著《春秋公羊传通义》十一卷, 于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条例师法不坠。”在《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中, 阮元又称其书“成一家之言”。连对孔广森的春秋公羊学有激烈批评的刘逢禄也不得不承认:“武进张氏始治虞氏《易》, 曲阜孔子治《公羊春秋》, 今文之学, 萌芽渐复。”^[1]“清兴百有余年, 而曲阜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2]《清儒学案·晓楼学案》中说:“乾隆嘉庆之际, 治公羊学者以驛轩孔氏、申受刘氏为大师, 皆谨守何氏之说, 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这些说法都认为, 孔广森的经学遵循了春秋公羊学的家法。2012年,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编纂的《儒藏论坛》, 载陈冬冬《孔广森及〈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学术史评价三题》一文, 该文中还用统计数据为说:“孔广

孔广森在《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中, 曾以“冀备一家之言”自许, 在去世前夕, 他还以其书郑重地托付其弟孔广廉。虽然人们对《公羊春秋经

[收稿日期] 2017-03-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清代今文经学新论”(项目编号:13BZX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开国, 男, 四川大英人, 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 黄子鉴, 四川成都人, 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讲师,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森在《通义》中对《春秋公羊传》所作疏解约有2499处。这些疏解中专门引用何休《解诂》或引用他说阐释发挥何休《解诂》的有1311处,完全符合公羊家法,合计占全书52.5%。利用《公羊传》经传互相疏证、专门引用其他今文家学说及引用徐彦疏的有161处,也可算是合乎公羊家法,合计约占6.4%。孔广森自行解说经传的、单独引用《左传》《穀梁传》学说的、引用非今文学说或著作驳斥《左传》《穀梁传》的共有1009处,虽未提倡今文家说,但也没有明显反对公羊家法,合计约占40.4%。只有引用非今文家学说著作驳斥《解诂》的6处、直接驳斥《解诂》的3处以及引用《左传》《穀梁传》驳斥《解诂》的9处,明显违背了何休与公羊家法,合计仅占0.7%。通过以上统计可以发现,总体来看,《通义》遵从了何休及汉代今文学家师说,并不违背公羊家法。”他也认为孔广森是春秋公羊学,而且是遵从公羊家法的。

守家法是汉代经学的特点,但清代讲今文经学的经学家没有一位是守家法的,连刘逢禄也不例外,更何况是孔广森^[3]。他们生活在清学的大背景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文字训诂的影响,特别是在经学发展已有二千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具有较为广博的经学素养,所以,汉代经学的守家法,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有存在的文化基础。孔广森也绝非谨守春秋公羊学,只讲一家之学,从他将其书取名“通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所谓“通义”,含义有二:一是兼通之义,意为兼通诸家之学;二是通达之义,意为非拘谨墨守一家之学。孔广森以“通义”解《春秋》与《公羊传》,明显受其师戴震的学术影响,戴震之学被当时学者称许为通儒之学,具有不偏主一家的特点^[4]。孔广森的训解《春秋公羊经传》,以“通义”命名,也具有反对墨守《公羊》一家之学之义。故他的“通义”兼采各家之学,对各种拘守一家之学的经学皆有批评,而主张有选择地会通各家之论。关于这一点,可以用阮元在《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曲阜圣裔孔奥轩先生思述祖志,则从事于《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异资,长通绝学,凡汉晋以来之治《春秋》者不下数百家,靡不综览,……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

一卷。^[5]

兼采各家,择善而从,这是孔广森将著述取名“通义”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孔广森遵守春秋公羊学的家法,实是不明“通义”的误解。而该书的具体论述,更可以证明孔广森的“通义”绝非是墨守公羊学家法的一家之学。

二

孔广森的春秋公羊学求其通义,所以,他不仅不守师法、家法,还明确对汉代经学的师法、家法提出质疑说:

古之通经者首重师法,三传要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斤斤罔敢废坠;其失者犹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证明,诚可以俟圣人复起而不惑,尚将参而从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诂揣量其智识之所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万分之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6]

师法并不完全合乎圣人之义,三传对《春秋》都有得有失,故决不能固守师法,墨守三传师法,就很可能以失为得,或者丢掉他人独得的圣人经意。《春秋》愈到后来愈是晦涩,就是由于经师的固守各家之学,而没有会通三传。只有会通三传,才可以探求到《春秋》真义。所以,孔广森的《春秋》学主张会通三传,而何休的墨守《公羊》,就被他认为是《解诂》的一惑,在书中遭到他的严厉批评。如何休释闵公元年“季子来归”,不信《左传》之说,就被孔广森斥为“支离之说”,不予采用:“何氏必不信《左氏》,乃以上传季子至为从家至朝,此经来归为自洛姑归,支离之说,今悉无取。”^[7]这种主张会通三传,而不固守《公羊》,是孔广森春秋公羊学的一大特点,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诸多证据。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书名看似以《公羊》为主,但绝没有墨守春秋公羊学,而是常常兼取各家之说。最常见的是孔广森兼采《左传》《穀梁》以证《公羊》之义,或纠《公羊》之失。如隐公二年,“纪子伯”,《公羊传》以“无闻焉”来解说,孔广森则据《左传》“子帛”,伯与帛乃是隶书书写之异^[8],来补《公羊》之失。桓公三年,“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羊传》解释说这是讥刺齐侯,何休说是因违反了父母不下堂送女之礼,孔广森则据《左传》

诸侯嫁女于小国,应下大夫送之为说,来纠正《公羊》之误。此外,在庄公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瞻”等条,孔广森也偶取《左传》为说。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左传》以为雨不克葬合于礼制,孔广森据《王制》“庶人悬封葬,不为雨止”,认为“明士以上皆为雨止也。……可知雨不克葬者,礼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训矣”^[9];都是用《左传》以证或纠《公羊》之义。相对而言,孔广森取《左传》较少,他取《穀梁》与《公羊》互证的材料更多,仅庄公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孔广森就5次引《穀梁》为说。孔广森的兼取《左传》《穀梁》,来补证《公羊》之说的会通三传观念,正是“通义”的特色体现。他的“通义”不但会通三传,甚至如阮元所说是会通至数百家,从汉代到清代的历代学者,如董仲舒、胡毋生、刘向、刘歆、何休、王祖游、何焯、刘敞、胡康侯、萧楚、徐彦、啖助、赵匡、赵汭、黄道周、惠士奇、戴震、姚大夫、庄存与等人关于《春秋》的论说,孔广森都有采获。兼采历代《春秋》说,成为孔广森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色,这也是孔广森经学的一个优点。同时,孔广森的公羊春秋学还主张六经相通。他说:“六经皆圣贤之语,曷为不可相通?”并斥责赵匡《春秋》之例不可通于六经之说,是“妄之妄也”^[10]。因此,他的“通义”不仅采三传为说,而且时常与六经相互引证为说。《易经》《尚书》《诗经》《周礼》《礼记》《仪礼》都被孔广森多次引用。此外,《尔雅》《说文》《音义》《竹书纪年》等书也被孔广森时常用来解释《春秋》。据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孙敬友的硕士论文《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简论》所作的统计,孔广森引用经、史、子部的数量如下:“经部:《易经》6次、《尚书》3次、《诗经》14次、《京氏易传》4次、《礼》(《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逸礼》)约90次、《尔雅》9次、《小尔雅》1次、《孟子》3次、《春秋繁露》10次、《白虎通义》9次、《五经异义》9次、《洪范五行志》8次、《膏肓》2次、《废疾》5次、《潜夫论》1次、《盐铁论》2次、《经典释文》11次;史部:《史记》10次、《汉书》5次、《国语》7次、《竹书纪年》1次、《汉书五行志》10次;子部:《管子》3次、《荀子》6次、《墨子》2次、《韩非子》2次、《庄子》6次、《鶡冠子》1次、《吕氏春秋》3次、《司马法》1次、《九章算术》1次;此外,孔氏还征引了石经:《熹平石经》9次、《开成石经》13次。”

孙敬友的论文虽然误将属子部的《潜夫论》《盐铁论》列入经部,但从中可见孔广森杂引各种学说的概况。

这种引用三传、六经,乃至杂引史书、文字训诂书籍以解《春秋》,是庄存与与孔广森的《春秋》学都具有的特点。虽然庄存与没有用“通义”来命名其书,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庄存与与孔广森都没有遵守春秋公羊学的家法,他们的《春秋》学或春秋公羊学,都是以《春秋公羊传》为主的“通义”之学。不唯通《春秋》各家,且通六经,通诸子,通史策,通文集。这也说明文化现象的一个规律,即越是后来的学说,就会包含愈益多的以前各种学说。而这一打着春秋公羊学旗号,杂采各家之说乃至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在晚清今文经学中更是泛滥成灾,孔广森的春秋公羊学则是最先的表现。

孔广森的探求“通义”,还带有清学文字训诂的特色。这不仅体现在他用历史故事来解释新周、故宋的经学微言,而且他的许多训解都是通过文字训诂而得出的。如隐公元年,据《尔雅》“正,长也”,来释“正月”为十二月之长,就没有了何休“王正月”的大一统^[11]。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学讲讨贼之义,而孔广森则重在对濮的地点的考证^[12];桓公六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以“得正”为解,何休以“美得正义”说,而孔广森则重在训解以、从的区别:“以人从己曰以,以己从人曰从,言从王者,诸侯畏威服义,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无战。”^[13]就没有了《公羊》学所肯定的尊王之义。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灾”,董仲舒以“黜周”为说,何休以王鲁为说,孔广森则讲什么“有室曰寝,无室曰谢”,并引《汉书·地理志》以证其地,以“谢读如序”等说明“谢”的得名^[14]。这些类似的训解都没有春秋公羊学的微言之义,只有文字训诂、典制考辨的内容,完全是乾嘉汉学的文字训诂路数。所以,孔广森虽然以探求《春秋》“新意”为目标,但又常常用文字训诂来代替对大义探讨。这是孔广森的《春秋》学较多受到乾嘉汉学影响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孔广森的春秋公羊学,反倒不如庄存与的《春秋》学真正贯穿了探求大义的旨趣。

三

孔广森所要追寻的《春秋》“通义”是什么?用

一句话来说,就是所谓《春秋》的“新意”。强调《春秋》有“新意”,以“通义”说明《春秋》“新意”,是孔广森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他的春秋公羊学的一切论点皆由此而出。孔广森说: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凌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而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托之《春秋》。^[15]

孔子有帝王之德,却无帝王之位,为了将自己的伟大抱负与理想留存后世,而著《春秋》,《春秋》有孔子为继周的后王所立的法典,这一说法与孟子的《春秋》为天子之事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没有春秋公羊学神化孔子受命的神怪之说。但此说与庄存与以孔子为至圣的看法是有差异的,庄存与只说孔子著《春秋》是对先圣的继承,有因而无革;孔广森之说则有因有革,强调的是孔子损益六代礼乐文质的革的一面,是为继周之王所立的“新国之典”,而有“《春秋》托王义”^[16]之说。由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推出《春秋》包含孔子“新意”的论点。他说:

《春秋》之制者,君子所托新意,损益周制,以为后王法。^[17]

故《春秋》一书,就绝不是庄存与所说的只是对先圣的继承,而是孔子政治理想的寄托,是后王治理国家的一王大法。这表明,孔广森的《春秋》“新意”说,同孟子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也决定了孔广森对《春秋》“新意”发明的方向只能是政治大义。庄存与的《春秋》重义,孔广森的公羊春秋学重“新意”,一个“新”字突出了孔子著《春秋》的革的创新性一面。

孔子著《春秋》是为后王立一王大法,孔广森这一说法看似与汉代春秋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一致的,但二者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汉代春秋公羊学言素王改制,不仅神化孔子为后知万世的圣人,而且提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改制说,附会为孔子为赤制,是为汉立一王大法,孔广森对此是坚决否定的:

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18]

治《公羊》者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指《公羊传》宣公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灾”),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见《晋书·王接传》)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舛,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19]

黜周即新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为董仲舒之说,孔子为汉制法本出于谶纬神学,这些微言与王鲁说都构成何休《解诂》最重要的观念。孔广森则认为,这些说法在《公羊传》中是没有依据的。他据《穀梁传》桓公二年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旧是宋人。”认为故宋本为《穀梁》之说,本意指孔子为宋人之后,而与春秋公羊学没有联系。所以,孔广森说:“故宋无传文,惟《穀梁》有之,然意犹不相涉。”^[20]而新周不过是周迁徙于成周之义,孔广森说:

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迁成周,作传者号为成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郛之地,谓之新郑,实非如注解。^[21]

孔广森对新周、故宋的解释,完全是从孔子的家世、东周京城迁徙^[22]的历史为说,这就丝毫没有了董仲舒、何休的新周、故宋、王鲁说的微言了。孔广森否定何休的新周、故宋、王鲁说,也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如陈澧在1881年的《东塾读书记》卷十中就据孔广森的以上说法,来批评何休、刘逢禄之说,并称许孔广森为《公羊》之功臣:“《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来将二千年,自巽轩乃得其解,可谓《公羊》之功臣矣。”然而,孔广森的以历史解说《公羊》,与他自己所说的《春秋》重义不重事,应该注重义理的发挥是背道而驰的。孔广森的《春秋》学不同于何休之学,就主要体现在没有经学微言上。由此也决定了孔广森的“通义”不包含春秋公羊学的孔子为赤制等相关的经学微言,更谈不上正面发挥,这与他从大义去发明《春秋》“新意”、追寻“通义”的方向是一致的。

(下转第124页)

- [4][28]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298、299页。
- [5][7][8][12][13][18][22][24][25][26][27]林慎思:《续孟子》卷下、卷下、卷上、卷上、卷下、卷上、卷下、卷上、卷下、卷下,《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6][9][10][14][15][16][17][19][20][23]《孟子》离娄上、尽心下、梁惠王下、告子下、梁惠王上、告子下、梁惠王上、公孙丑上、告子下、梁惠王下。
-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8页。
- [21]崔珏:《哭李商隐》,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九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2页。
- [29][30][31]顾宏义、戴扬本等:《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353、354页。
- [32]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56页。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Mencius Continued" by Lin Shensi

TANG Ming-gu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Keywords: Lin Shensi; Mencius; continuation

Abstract: Lin Shensi, a master of Confucianism in late Tang Dynasty, continued the classic work Mencius to elucidate his ow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express his worldly concerns, in the hope of expressing his intention of rectifying worldly affairs and vitalizing the state by means of Mencius' words. He continued and preached Mencius' thoughts that "there's no one who isn't righteous if the monarch is righteous" and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He also inherited Mencius' idea of morality, profit and talents. On the one hand, this practice of interpreting classic work with one's own intention "indirectly expounded"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through its combination with social reality, being of striking appropriateness and pertin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ractice influenced to some ext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terpreting paradigm in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李文亚]

(上接第118页)

[参 考 文 献]

- [1][2]刘逢禄:《刘礼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57页。
- [3]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发展阶段略论》,《哲学研究》,2013年第11期。
- [4]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四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页。
- [5]阮元:《研经室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
-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卷四、卷一、卷四、卷六、卷一、卷一、卷二、卷七、叙、卷十、卷十一、叙、卷七、卷七、卷七,《清经解·续清经解》(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 [22]黄开国:《庄存与〈春秋〉学新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

The Explain of Kong Guangsen's "general meaning" in the Gongyang-Studies of CHUNQIU

HUANG Kai-guo HUANG Zi-jian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Keywords: Kong Guangsen; the Gongyang-studies; the general meaning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Kong Guangsen's "the general meaning of the Gongyang Commentary of CHUNQIU" was the first book using the name "Gongyang", but this book was not only the opinion of "Gongyang", it is a writing with the general meaning. This book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Gongyang, but advocated containing the three explanatory works of CHUNQIU, even the Six classics and their theories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methods of scholarly research, this book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Qianjia sinology's emphasis on the explana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books. "The general meaning" which the Kong Guangsen was seeking for is only the "new meaning" in the "CHUNQIU" written by Confucius. The "new meaning" developed by Kong Guangsen is the deep meaning but not the sublime words of the Gongyang-studies of CHUNQIU.

[责任编辑:李文亚]